公開組亞軍　溫炤縉

一句經典的啟示

《文心雕龍．宗經》載：「經也者，恆久之正道，不刊之鴻教也。」經典正是永恆的、普遍的真理，引領人心向善，締造大同盛世的不二法門。中華文化五千年，經典浩如煙海，或儒或道或釋，都留下了不少經典和前人智慧不斷砥礪正氣，照耀古今中外。但所謂學海無涯，當中又有否一句經典的啟示，讓人拳拳服膺、受用終生？對此，筆者以為朱熹的「執中用極」，正能為暮氣沉沉的世道人心，注入旺盛的生命力，體現「中庸之道」的至德。

眾所周知，「中庸之道」講究「執兩用中」，意指掌握、了解事情的兩極，從中尋找最恰當的方法，並奉之不易，故程子曾言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」。據此，朱子進一步發揮孟子的「時中論」，主張「當厚則厚，即厚上是中；當薄則薄，即薄上是中」，「用極」亦為「執中」，大大擴闊了「中」的範圍和靈活性，並消除了「中庸之道」陷入折衷主義的泥沼中，體現眾德之目－「仁」的極致。

此外，由於「用極」者多為少數，故更能考驗當事人了解事情的智慧和與多數人為異的勇氣。對此，孟子便曾言：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縱觀上言，可知「執中用極」正能合「智、仁、勇」三達德於一身，充分反映「中庸至德」的內蘊。

孔子曾言：「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！」伊尹、伯夷兩人因其才性，而為聖之任者和清者，然細究其中底蘊，便知兩人所行實為「執中用極」的中庸典範。

伊尹為商湯名相，在輔期間，扶湯滅桀，下開殷商百年盛世。商湯亡後，伊尹歷任外丙、仲壬、太甲、沃丁的宰輔。然而，伊尹最為後世稱頌的事，尚有放太甲一事。當時，太甲無道，上不尊商湯之政，下不行勤政之舉，致使國事荒廢，故此伊尹決意將之放逐桐宮，待其反思己過，即歸位還政，成就中興之勢。於此，伊尹久為人臣竟敢放逐君主，實為用極之事，然伊尹為天下蒼生，足見其仁，敢於任事，足見其勇；放之不殺，使其改過，足見其智，故此伊尹放太甲實為「智、仁、勇」並舉，足見其「執中用極」。

伯夷為殷商遺臣，極力反對武王伐紂，曾於軍前叩馬而諫，武王左右欲殺之，幸得太公釋之，並稱其為「義人」。後來，武王伐紂，伯夷不值武王之舉，與其弟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採薇而食之」，後更餓死山上。或許，有人以為伯夷不知變通，愚忠於紂，實是愚不可及。但仔細觀之，伯夷為國盡忠，且能以身殉之，雖為極端之事，但亦因此，而得清聖之名。

縱觀上述，可知「執兩用中」之「中」絕非兩極之「中」，更非只問「中間」不問是非的「中」，而且有些時候，在衡量輕重緩急後，才會發現極端之舉更能體現「中」之所在。伊、伯兩人依其才性，而得聖之一端，此正如錢穆所言：「他們之偉大，偉大在做人徹底，都跑在一頂端尖角上，個性極分明。」當中，「徹底」正是「極」的意思，「做得徹底」正是「執中用極」。

最後，筆者以為「執中用極」除能指示人們成就一端之聖外，更能引領人們成就「時中之道」。綜合上言，伊、伯二人均走在一端之極，此正如錢穆所指：「但卻有偏缺不圓滿，不是一個大聖人。」縱觀歷史，能成就圓滿的聖境，實唯孔子一人。

觀乎孔子一生，其志向遠大，望能得君行道，故半生顛簸，以求為世所用，此即伊尹之「任」。孔子亦嘗入朝為官，且政績斐然，此既為君主所賞識，亦招徠不少人攻擊，但孔子仍能依道而行，處之泰然，不驕不餒，此正如「不以三公易其介」的柳下惠之「和」。最後，孔子勞碌半生，但現實情況讓其清楚意識到「道之不行」，已成定局，他又不願曲己阿世，奉迎在上位者，故又隱居山林，以育英材，望能「覺民行道」，故此氣節即如伯夷之「清」。

綜合上言，孔子因己志向，故能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但又不能不卑不亢，不輕易改變原則，委屈求生。最後，又能知所進退，絕不強求，故又另尋他法，以貫徹本意。由此可見，孔子身兼「任」、「清」、「和」的特質，且既能靈活變通，又能堅守原則，更能「做得徹底」，應「任」則「任」，應「清」則「清」，應「和」則「和」，「執中用極」，達到「中庸之道」的至境，　因「時」而行「時中之道」。

現代社會講究分工合作，人際關係變得複雜，大多數人均取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」的心態，只望隨波逐流，不願壁立萬仞，是非因而變得模糊、相對，甚至虛無，「以紫奪朱」的鄉愿多如恆河沙數，而「擇善固執」的「中行」已然難以實現。筆者還望「執中用極」能如一道猛藥，振奮已然衰頹的人心，讓人敢作敢為；興起衰落的中華文化，一洗後世對「中庸之道」的誤解，此即「一句經典的啟示」。

評語: 作者指出，中庸絕非僅求兩極之中，更非只取「中間」而不問是非。為人應智仁勇兼備，擇善固執，所論頗有個人見解，且具深度。